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的 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三卷）

罗福惠 朱 英 主编

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

何卓恩 等 著

阅 览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K25/.07
2013/1
3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的 百年记忆与诠释 (第三卷)

罗福惠 朱 英 主编

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

何卓恩 等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罗福惠,朱英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53-1

I. ①辛… II. ①罗… ②朱…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26 号

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三卷)

罗福惠 朱 英 主编

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

何卓恩 等著

责任编辑:张 忠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总印张:146.5

总字数:2238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总定价:38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导论

罗福惠

—

在辛亥革命已经成为百年往事的今天，研究中国人百年来的“辛亥革命记忆史”，与研究当时的辛亥革命事件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或许“记忆史”的研究多少有些“另类”，但它其实是史学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甚至能给史学研究展示一个此前已经朦胧存在，此后或许逐渐明晰的研究领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穆先生面对疑古史学和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时，一方面表现出尊重古史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表示“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象为又一事。当知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象，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①。到1980年代，西方史学界研究“历史记忆”成为潮流，美国历史学者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一文中说，米歇尔·福柯认为“研究历史就始终只能是研究各种回忆形式”，这种观点过于“古怪”，但史学应该是“这样一门学问，它考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传给我们的”^②。钱穆所说的“活泼之想象”，詹姆斯所说的“所发生的事情

①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② [美]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是如何传给我们的”内容和过程，就是今人所说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人类特有的记忆功能之一。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认知心理学》中指出，13岁以前的儿童应该以记忆为“学习”的核心，而不应强调对“为什么”的追问与理解。当人们把记忆运用到历史的问题上时，不是讥笑没有历史记忆的个人或群体为未成年人，实际上这样的个人和群体并不存在，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基于对历史记忆的高度重视：只有保持历史记忆的人，才不仅是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仅是经济学或技术科学意义上的人，更是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人。

除了历史学家之外，对于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历史记忆的“天敌”是时移世易。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钱穆虽然提出“某一时代人”对古史的“活泼之想象”也应作为“一极端重要之事项”加以研究，但此类研究最终还是不成阵势。由于“集体记忆始终是受现实需要支配的”，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国家，“记忆史研究始终以近现代史为主”^①。然而进一步考虑，即使就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而言，大小事件之多指不胜屈，有名或无名的人物更是成千累万，但经过各种原因和方式的过滤，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成为不同场所的历史记忆。

这里就出现了记忆层次及与其相关的记忆场所的问题。借鉴20世纪前期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以及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的《记忆场所》的有关理论，结合个人的思考，我们可以把有关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忆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私人记忆或个体记忆，比如辛亥革命亲历亲见者的记忆，无论是以日记、回忆录还是以访谈口述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其记忆所传播的场所都只能是家庭、亲友和少数读者的较小范围。第二层是群体记忆，它包括曾经活动于相同的历史时空，与同一事件存在某种关系的记忆，由于立场和利益并非一致，故各自经过选择和过滤而留下的历史记忆可能多种多样。这个层次上的群体不止一个，所以不能称为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此时的记忆场所范围虽然扩大，但仍然不是

^①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一个民族国家的公共记忆空间。第三层是集体记忆，或者甚至已经成为公共记忆的“新传统”中的一部分。此时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虽已消失，但事件的性质和意义，或者事件领导人和参与者的理念和精神经过时间的考验，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与影响，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社会记忆”。这种公共记忆的新传统以民族国家为空间场所，甚至会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软实力。

近现代的公共记忆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记忆，除了时间切近的原因之外，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如各种文书档案资料的保留，报章杂志、相关文字记载的传播能力巨大，还有照相、录音进而陆续出现了影视制作，从而使得近现代的社会记忆较之古史记忆，存在着丰富得多的实质性的知识或者可以名之为实证经验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近现代国家的政府、政党与各种社会力量在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它们通过话语权、制度安排以及各种方式的社会动员，应时势所需和目标诉求，编写和出版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制作了各种文化产品，并为有关人物树碑立传，保护和修复有关遗址遗迹，兴建纪念场所，举办纪念会，直至确定固定的纪念节日，举行或庄重或轻松的纪念仪式。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社会有“三多”，一是选举多，二是游行示威多，三是纪念节日多。后者的作用，就是唤醒或强化人们的某种历史记忆，或者要让这种历史记忆得到保存和延续。

所以“历史”的呈现方式，并非仅仅体现为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而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员文宣，社会各界的相关记忆和纪念，无言的历史遗迹及在相关场所进行的仪式和观览，还有各种文学和艺术制作，以及今天的音像制品乃至网络空间等，都包含有“历史”存在和传播的可能性。

二

辛亥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大事件，故辛亥革命记忆的浓淡，也就同中国政治格局的迁演紧密关联。1912年民国初建，全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庆祝仪式和对辛亥先烈的悼念活动。短短数月后，站在反对辛亥革命立场的袁世凯获取了中央政权，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记忆即开始降温。首义之地武汉率先在全国成立的湖北革命实录馆

被解散。此后继承袁氏衣钵的多位北洋武人，始终努力淡化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记忆。所以孙中山在1916年8月巡视浙江时，就发现“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大抵为袁氏毁灭无遗”^①。同时，直至1920年代还很活跃的逊清遗老，在相关的日记、札记、书信乃至著作中，仍然称革命为“乱”，称革命者为“匪”，这些虽然属于“个体记忆”或“群体记忆”，但仍然显示出“辛亥革命记忆”处于淡化和分裂的状况。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仍然从事革命斗争，需要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和鼓舞人民继续加入战斗队伍，也逐渐建构起本群体的辛亥革命记忆，不过这种记忆的主要场所限于国民党所掌控的地域范围，所进行的纪念活动多以“党”的名义进行。

从1928年起，国民党基本上掌控了全国政权，为论证执政党的“光荣历史”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党政一直在强化辛亥革命记忆。在最初“法定”的举国进行的纪念节日中，与辛亥革命有关者占据多数。每年“双十”的大张旗鼓，中山陵的建立和频繁的“谒陵”，各种层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黄花岗烈士的悼念活动等等，无不指向特定的历史记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多数地方的民众动员会、誓师会、纪念会、演出和募捐，都在各地的中山公园举行，力图把继承辛亥先烈和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目的，与现实的“抗日”动员结合起来。在当时和事后的一些人看来，这些活动也曾经产生若干精神动员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局的表里不一，而且客观现实是各派系钩心斗角，官员贪渎腐败，军队缺乏战斗力，国弱民困且每况愈下，从而使得有关纪念成为徒具形式的走过场，官样的纪念宣传成了说者听者两不相信的八股口号，因此很难说官方的此类活动具有多大的作用。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导了辛亥革命记忆的重建。1956年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给孙中山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称赞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

^① 孙中山：《游西湖时的谈话》，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0页。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并且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①。此后政界人物的回忆和学界的研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辛亥革命亲历者吴玉章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全国政协组织辛亥革命参加者及有关人士撰写了回忆文章349篇，辑为《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册出版。地方部分省市也纷纷发掘、“抢救”各个层级的回忆资料和文物，出版了一大批资料和成果，并首次举行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虽有“文革”十年的挫折和倒退，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记忆”依然浓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章开沅、林增平与金冲及、胡绳武等分头撰写的两种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很快出版，全国各地的辛亥革命史迹和纪念设施得到修复、升格和增添。而在有关领导人总结20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的讲话中，无论是用“三次腾飞”还是“三次重大变革”等表述时，辛亥革命均被列为第一次。

国民党退踞台湾以后，“两蒋时代”仍然沿袭此前的辛亥革命记忆，相关的纪念日一如既往，还新设立了“国父纪念馆”等符号建筑，同时攻击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研究活动。对于1961年全国政协举办的有关活动，包括前述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当时台湾官方报纸上都有负面反应，仿佛大陆上的中国人不该有纪念辛亥革命的资格和诠释辛亥革命的话语权。但到了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独”意识形态逐步抬头，公然宣传“去中国化”，“台湾史”成为显学，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几被视为“外国史”。尽管在两岸的学术界中，辛亥革命和民国史还是一个重要的甚至不乏共识的话题，但不可否认，台湾社会上辛亥革命记忆在渐趋淡化。

回顾百年来中国人的辛亥革命记忆的消长变化，除了时移世易这个基本因素之外，从各种辛亥革命记忆的取向、强化或者“遗忘”中，实可发现其背后对于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和民主共和理念的认同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认同等层次上的差异或缺失。由此可见，历史记忆的问题不仅关乎历史知识、社会心理，也是一个思想史上的问题。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

三

在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的历史记忆中，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其次是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人们记忆的重点。记忆重点的形成，仅靠时间切近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此类事件通过时间考验后仍能显示出长远而巨大的影响和意义。应该说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而言亦是如此。

众所周知，梁启超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曾经因不赞成三民主义和暴力革命而与同盟会人长期“论战”，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与梁氏持同样立场的立宪派因“咸与维新”而与清王朝决裂，梁启超也很快转变态度，强调推翻清王朝是革命派的武装斗争和立宪运动的共同作用所致。故在民国建立十周年纪念之际，他的两次讲演均对辛亥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他委婉地批驳了当时社会上部分人因“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以为“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指出辛亥革命“从历史上看来，具有空前绝大的意义”。为什么能这样讲？梁氏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这种自觉包括“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他具体解释说“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一是“中华民族之扩大”，二是“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的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所以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值得记忆和纪念的，“双十节纪念，纪念个什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什么要纪念这个意义？只要我们把这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他称辛亥精神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藉”，也就是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传统。只要如此，此后中国“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①。梁氏还认为，民国十年，中国的政治尚远不如人意，但实业和教育事业

^①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5页；《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47页。

有了客观的发展进步。众所周知，“民国十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界不仅有俄式社会主义的传入，还有西式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流行，逊清遗老遗少的思想影响存在等，使得当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梁启超的“改革而非革命”的社会立场和比较开阔宏远的思想视野所致，他的这番基本评价，还是比较公允客观的。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可以肯定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而且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一系列新气象、新变化的起点和基础。辛亥革命“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以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①，构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传统。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起点，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到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一名独立成员的起点。以上两点，已经基本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综合近二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或许还应该补充三条：其一，在辛亥革命的初期酝酿阶段，革命者构想的是驱除满族，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国家，但由于立宪派坚持视满人为中国人的立场并与革命派论争，而且在随后的革命起义过程中，各族人民先后以“翊赞共和”的实际行动，共同维护了已有长期存在历史的民族共同体，革命派迅速调整方针政策，摒弃“驱除鞑虏”、“排满”等口号，而代之以“五族共和”。因此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打下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这一重大转变的基础。其二，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实业界和教育界的新变化，还有孙中山先生随后制订的《实业计划》，可以证明辛亥革命为此后的中国第一波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其三，辛亥革命时期传入了社会主义思潮，而孙中山先生强调“民生主义便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者是“好朋友”^②，由此造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而也为中国人民接受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由于辛亥革命这一事件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具有上述影响和意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66、567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381、386页。

义，故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加之广义上的“革命尚未成功”，“振兴中华”的目标也只是初步完成，作为几代革命先进贤继承者的中国人；保持包括“辛亥革命记忆”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忆，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

四

“记忆”与“遗忘”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表述化的历史，在形成过程中都包含着对过去的记忆和遗忘。这种情形的产生，内在因素是记忆在传承过程中因记忆主体（个人或与该历史事件有某种联系的群体）的逐渐消失而被社会淡忘，外在因素则是历史与正统性原理的关系，即政治力量的介入难免影响到社会是选择记忆还是选择遗忘。而在深入研究历史记忆时，又可发现其中存有两种运思路径，一是客观主义的，强调历史记忆的历史性；一是相对主义的，强调记忆的建构特征。历史认识方法论的回转，无论是对天真的历史实证主义还是科学的“历史经验论”，都构成了咄咄逼人的挑战。自信的历史叙述和简约化的历史结论，都面临一波新的检验。在这种形势面前，把历史学真正视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学，弄清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对历史学的影响，不再专注于官方文献和学者的言说，把包括构成社会文化的各种记忆传说、空间遗迹和纪念仪式等等，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无疑会丰富历史的研究内容，增加历史学的活力。

由于记忆不仅受到政治形势、社会力量、学术研究乃至空间和物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具有以多样性和流变性为基础的建构性特征，所以在具体研究有关辛亥革命的记忆时，既需要划分时段和空间场所，又要分门别类地对历来的政府、政党、社会各界（如工农大众、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民族界、华侨界等等）与辛亥革命的渊源或者精神的联系进行考察，分析种种辛亥革命记忆如何产生，具有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表达。对于各种记忆表达所明现或隐含的现实诉求应加以探讨，并尽可能地发掘辛亥革命记忆这一新传统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公共记忆的价值。研究所用材料则来自报刊上各时期政府、政党、团体组织以领导人或以组织名义发布的文告；重要人士的有关讲演；辛亥革命亲历者或相关者的日记、书札、回忆录、访谈录之类；也涉及教科书中对辛亥革命记叙的变化，文艺作品对辛亥革命元素的运用和塑造；还有关于纪念空间和仪式的探